

巴洛克的吊詭可能－傅柯的〈外邊思維〉

波赫士在某一本詩集的序言中說：「作家的命運是很奇特的。開頭往往是巴洛克式，愛虛榮的巴洛克式，多年後，如果吉星高照，他有可能達到的不是簡練（簡練算不了什麼），而是謙遜隱蔽的複雜性。」我們不太確定傅柯是否曾讀過這段話，不過在他才華洋溢的巨著－《詞與物》（1966）中，卻極巧合地以對波赫士作品的桀桀怪笑開啟了他自己的巴洛克式風格。當然，這個「愛虛榮的巴洛克式」傅柯並不始於《詞與物》，粗略地說，從六〇年代的「文學時期」到七〇年代的「監獄時期」，傅柯似乎都投身在一種躁熱熾烈的巴洛克式誇大狂（*mégalo manie*）狀態裡；然後，毫無跡象的，是《性史》卷二呈顯的枯山水。我們不僅驚駭於傅柯狂躁時的狂躁，更震懾於他轉變褶皺後的隱蔽複雜；從一逕張牙舞爪到最終「謙遜隱蔽的複雜性」，有幾篇文章或著作的章節對於理解傅柯思想似乎是極關鍵的。其中之一，正是發表於 1966 年的〈外邊思維〉（*« La pensée du dehors »*）。

無疑的，這是傅柯「文學時期」的代表作。由對布朗修（M. Blanchot）的評論作為起手式，傅柯以綿密論述再度牽引出他在這時期所深深著迷且一再援引的沙德（D. A. F. Sade）、克羅索斯基（P. Klossowski）、胡塞（R. Rousset）、巴塔伊（G. Bataille）、馬拉美（E. Mallarmé）、阿鐸（A. Artaud）……。誠如譯者洪維信在「譯者導言」中明白指出的，透過這些作家傅柯曾對文學展露強烈興趣與深刻思索；然而，傅柯是否就如大部份論者所言，一邁過六〇年代就戛然而止其文學關注，轉向「歷史學研究」？文學時期是否僅是傅柯早期思想中一塊無法彌合的碎片、一件值得懊惱的錯誤？這時期所提出的概念，諸如域外（洪譯「外邊」）、越界（洪譯「越渡」）等，是否如某些論者所言，已徹底被晚期傅柯所揚棄與疏遠？或許我們已經太熟悉一個制式與庸俗化的傅柯或傅柯研究，〈外邊思維〉中譯文的出版無疑挑起我們重新閱讀傅柯原典的動機：或許「文學時期」（六〇年代）的傅柯與「性史時期」（八〇年代）的傅柯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或許這兩者只是同一塊思想平面的拓樸學皺褶或翻轉？簡言之，〈外邊思維〉在今日的中譯出版絕對不僅是讓我們釐清傅柯文學時期的思潮脈絡，或許將更逼使我們去

質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究竟什麼是傅柯文學時期的哲學意義？存不存在一種關於傅柯思想平面的強度連續性（*continuums d'intensité*）研究？

譯者洪維信不僅細心逐譯與注解這篇經典論文，也提出極深入專業的導言；特別是導言最後，關於法文詞彙中譯的個人理解及堅持，似乎也標誌了近年來法國當代哲學原典中譯的獨特現象：翻譯行動本身即哲學思考與研究的一部份。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沈志中極具個人風格的譯出《精神分析詞彙》（行人），林志明不厭其詳地重譯《古典時代瘋狂史》（時報）與《布赫迪厄論電視》（麥田），蘇哲安別具運動意涵的譯出《解構共同體》（桂冠），龔卓軍盈溢詩意與文學隱喻的《空間詩學》（張老師）……。翻譯從此轉化成一道個人手勢，同時成為特異與激進的哲學實踐。儘管偶爾我們並不太能被譯者（同時也是研究者與思索者）的解釋所說服；譬如本書中，洪維信將傅柯、德希達、德勒茲、李歐塔等法國哲學家都曾獨特構思的 *dehors* 譯為「外邊」，捨台灣較通用的「域外」不用，選擇一個強烈指涉內/外空間性的詞彙，儘管譯者藉此堅持其法語的生活意涵，但恐怕卻因此犧牲其原本反歐幾里德空間性的哲學企圖；再者，如果「外邊」取其日常性，*transgression* 譯為「越渡」則似乎又遠遠「僭越」了這個日常性的堅持……。

在近期出版的譯書中，洪維信的《外邊思維》、蘇哲安的《解構共同體》與龔卓軍的《空間詩學》無疑已向本地的法國哲學研究射出一枝待人拾起的響箭，其所標誌的不僅是傅柯、儂曦或巴舍拉研究的出發或再出發，同時也是藉由法國當代思想中譯所掀起的激進哲學思索。而隨著近來法國哲學研究者的遞增，彼此間透過論文或翻譯所進行的直接與間接對話勢將愈形壯碩繁複，我們相當期待，也樂觀其成。